

領袖集權下的國民參政會……劉偉森
 港紙價值之原因及其對策……洪瑞鑾
 教育在抗戰時期之重要性……劉偉森
 抗戰中的輿論……劉偉森
 徵收重稅財產充實抗戰力量……鄭鍾仁
 日本從軍事失敗到經濟危機……任顯輝
 廣武道上(征途紀實)……任顯輝
 張國森敬告國人書……任顯輝
 新生(詩)……三篇
 畫沙史料……三篇
 小輔心……三篇

軸心

第七期

版出日一十二月五年七十二

編輯者 軸心旬刊社
 社址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東街十四號四樓
 各埠代售處 廣州惠新東街十四號四樓
 零售 每份五分
 訂費 每月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全年十二元(郵費在內)
 本報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星期一、十一、二十一出版

領袖集權下的國民參政會

劉偉森

臨全代會確立了黨的領袖制度，同時決議了創設國民參政會。國民黨是以黨治國的民族政黨，它的總裁又是從實際抗戰行動中取得全民擁護的蔣委員長，則黨的領袖制度之確立，實即民族領袖之確立，在國家的觀點上，尤其在國家戰時的需要上，他無異於一國的集權元首。至於國民參政會，從名義上之詮釋，參政員地域分配的普遍，「審議」，「建議」，「詢問」權之賦予，則又無異乎一個民意機關。

論者謂領袖制度是中央權力的集中，全民意志行動的領導重心，而民意機關是民權的伸張，政治的民主化；前者以領袖爲中心，民衆聆聽從領袖的領導，後者以民爲主，當政者得跟着民衆走。意義迥然不同，甚至竟然相反。我們現在將這兩個制度同時運用，故有從深探考而求調協之必要。

原來問題的關鍵在國民參政會，而在領袖制度。

我們必須認識：國民參政會雖是一個民意機關，但它不是一般的經常民意機關，尤不是歐美式的議會。它祇是一個抗戰期間臨時的國民參政機關。惟其如此，始能與領袖制度並行而不悖。以下我們就客觀需要和主觀條件上指出國民參政會的本質。

第一、在建國程序上，國民參政會不能視作

可以代替國民大會的經常民意機關。建國階段，目前還在訓政時期，地方自治還沒有完成，國民參政能力仍待培養；抗戰以前，政府雖曾籌備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惟軍興以後，已宣告延期，訓政時期遂亦因而展長。實則憲法一日未頒佈，我們的憲政還沒有開始，經常的民意機關仍未有設立之法的根據。臨全代表宣言關於此點，曾經說明「抗戰既起，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時，惟有依據國民會議所制定頒佈之約法，以行使治權，惟爲適中應戰時需要計：：應設置國民參政機關，俾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政府設立參政會的本意，顯然並非所以代替國民大會的經常民意機關，其作用只在延攬賢衆，相與參商抗戰大計，以供政府之採擇，而政府此時，仍得依據約法，行使治權，繼續訓政。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亦經指出「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爲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參政會其爲抗戰期間臨時的國民參政機關也明甚。

第二、在戰時需要上，純粹的經常民意機關沒有設立之必要。抗戰期間，事勢瞬息萬變，非有一個集中權力的領袖，駕馭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作非常的緊急處置，不足以應付事變。此時而尙欲行絕對民主政治，孜孜以圖爭辯，相持不決

尙欲行絕對民主政治，孜孜以圖爭辯，相持不決

，則「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之險象，又恐重現於今日！且軍興以還，戰區蔓延九省，民衆流離失所者數達一萬萬，求生之不遑，何暇侈談民主！臨全代會宣言有云：「抗戰勝利之日，結束軍事，推行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建設」。平心而論，民族生死存亡最後關頭之今日，決不是設立純粹的經常民意機關，以運用多黨民主政治的時候。

第三、在本身組織上，國民參政會祇是一個抗戰期間網羅人才的機關。參政員的產生，側重文化經濟團體的代表，這顯然意在集中全副專才，參與大計，使抗戰建國專家化，技術化；參政員年齡規定必須在三十歲以上，這顯然意在廣攬老成練達之士，相與謀商國是。參政員一百五十名中，一百名分配各省市及海外蒙藏各地，俾由當地黨政機關及僑務蒙藏兩委員會提出加倍名額，呈由中央決定；五十名由國防最高會議選任，這種辦法，雖說是抗戰期間普選爲事實不易舉辦，此爲權宜之計，惟既然不是真正的民選，則何必一定強之爲純粹表達民意的機關？從這二點的引証，參政會設立的本意，在延攬專才老成，俾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以完成「抗戰必勝」的共同目標，亦彰彰明甚。

第四、在法定的職權上，國民參政會有異於歐美式的議院。參政會的職權，只規定「得提出建議案於政府」，並「有聽

取政府施政報告暨向政府提出詢問案之權」。而最後決定權仍在「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遇有緊急特殊情形，國防最高會議得爲便宜之措施。簡言之，它只有建議，審議，詢問之權，而不具備歐美式議院的制法和監督牽制之權能，且在五權分立的三民主義政治組織下，我們已有立法院訂制法律，有監察院執行監督，自無需重複混雜，致亂系統。故國民參政會，只是一個設計獻議以輔佐政府，推行國策的機關，不能與歐美式議會混爲一談。

上文所述，旨在闡明參政會之所以爲參政會，而與領袖集權並行不悖。我們的結論是：現階段的國民參政會，應是領袖的建議機關，抗戰建國計劃的諮詢機關，等於羅斯福總統的智囊團。參政員的使命，在獻其才智於國家於領袖，使抗戰建國能達到專家化技術化，本身並不具備牽制政府的任務。抗戰已屬全民所一致要求，建國工作復以軍事爲中心，一切計劃已有抗戰建國綱領可循，政治思想且有三民主義爲共同最高準則，凡此全民所祈求者，已由全民共戴的領袖在堅決執行，而且在節節開展，故民意實已充分表達。他日參政員諸君之偉大成就，即所以輔佐領袖竟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大勳也。在國民參政會加速籌組中的今日，吾人敢以此言，奉獻參政員諸君。 廿七、五、十四。

新 生 韶 光

沒有陽光照耀的疆土，
大地熄滅了美麗的光輝，
我們永遠不能忘懷，
那！

廣闊天野，
蜿蜒的河流；
我們永遠不能忘懷，
那！

× 豐富的寶藏，
× 親熱的百姓，
×

沒有炳蔚的月亮和辰星，
只有死寂的曠野，
靜悄悄的長夜，
沙漠吹來的金風，
燃燒我們搶救祖國危亡的烽火，
激動我們洶湧的血潮，
起來吧！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挺着你的胸膛，
握着你的槍桿，
我們要！
敵頭當酒杯，
飲盡誓仇血，
× × × × ×

呵！
誰的足跡踏遍了
神州，
誰的碧血點綴了
雪花，

是的，這是我們換來的
代價，
萬年不滅的光華

我們正在詩頌偉大的
詩史，
人類的希望。

港紙漲價之原因及其對策

洪瑞堅

數月以來，港紙與省券之比價，由加五六之間，逐步上升，及至最近，此種漲風，不獨未見減弱，而益呈急激之勢，兼旬以內，竟由加七而達加九以上，（據五月十三中山日報載）打破從來未有之紀錄，朝野各界，因之莫不怒焉心變，以為抗戰時期金融上之劇烈變動，足以影響後方之經濟生活，若不設法救濟，後患實至可慮，於是當局專家之談話，屢見報載，惜皆一鱗半爪，每使讀者有未窺全豹之感，作者不敏，第以問題重大，難安緘默，謹將管見所及，指陳漲價之原因，並對付之方策，尚望當世明達，有以教正幸甚。

我國自抗戰軍興以來，沿海要埠，相繼淪陷，廣州一地，遂成爲對外貿易唯一之主要口岸，昔日進出口貿易之由上海及其他各埠轉運者，至是皆集中於廣州，此可於省港貨運之擁擠，粵關收入之增加，可以見之，因之商家購買外匯，多亦集中廣州，使廣州外匯之需要，與貿易額之擴充，成正比例之增加，此爲港紙漲價之一因。

其次，自國幣政策實施以後，繼之而有外匯統制，泊乎抗戰發生，中央爲維持長期戰爭，勢須使外匯獲得安定，於是外

匯之管理，視前愈益嚴密，其爲國家金融設想，實屬至當，惟中國商人，素以自由主義者著稱，不慣於受統制管理，對之則不免感覺不便，同時我國外匯之統制，不及港紙，蓋港紙雖屬外幣，而買賣完全自由，商人爲逃避統制，因之競購港紙，以爲可以自由支配，遂使港紙比價，扶搖直上，莫知所屆，此種論斷，並非向壁虛構，試以近來英鎊美金匯價，取而觀之，即可大白，我人但見港紙日在漲價，而英美外匯，迄少變動，足見市面所需要者爲港紙，而非外匯，若商人須支付進出口貨價，大可向政府請購外匯，何必搜求比較高價之港紙，此中原因，實由於商人之不喜於向政府請購外匯，情至顯然，何況港紙別有妙用，容俟下文述之。

再次，港紙之漲價，由於資金逃避之結果，蓋當戰爭時期，交戰國資金之逃避，幾爲舉世普遍之現象，歐戰時各國資金逃避之例証，不勝枚舉，八一三以後，我國富豪巨賈，爭購外匯，提款轉存外商銀行，已成週知之事實，使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于是有去秋財部限制提款之命令，其後此風雖因政府功令所關，不若以前之烈，然而此種傾向，仍未或減最近中央

發行二萬五千元券，決心支持長期抗戰，以及敵兵在廈門登陸，使資金之逃避，再添一新刺激，富有者既無可藉口，在此嚴密統制之下，購得外匯，換儲港幣，實爲若輩認爲保護資金安全最妥當之一法。

此外，港紙漲價之原因，由于奸商所造成。回溯十個月抗戰之結果，敵國工商百業，受莫大之打擊，故對於中國市場之恢復，固無時無刻，不期求其早日實現，最近香港日貨之充斥，爲衆所共見，此種日貨，據稱率皆廉價傾銷，奸商貪圖私利，妄顧一切，或改裝換牌，或冒險私運，但以此種交易，非法律所容許，必須私相授受，以港紙支付，因之港紙之需求激增，幣價隨之而高，同時商人購辦外貨，如非抗戰時期所必需，竊恐向政府請購外匯，或受限制，自亦以港紙交易爲省事，故港紙雖日漲夜漲，英美匯率不變，港紙之需要，並不因之而減少。

最後，商人之操縱及民衆心理之變化，同與港紙漲價有關，因港紙既有避免受外匯統制，及其他國際貿易之妙用，一般人自樂于收受，其反影于羣衆心理之上者，即人人爭欲購儲，形成港紙步步看漲，莫知所以然之趨勢，而機警善買之商人，尤不免推波助瀾，從中操縱，使港幣價格，能超過實際需要之上，他如最近政府之限制攜帶國幣外幣出境，於民衆心理及商

人貿易上，俱有相當影響，至最近據稱有大宗洋米進口，認爲與港紙漲價有關，以個人所見，此種關係，並不顯著，因洋米之購進，爲政府所批准，商人支付米價，儘可向政府購買外匯，何必搜求高價之港紙以之償付，商人孜孜于利，此點寧有不計及之乎？又曰近來華僑匯款減少，外貨需要增加，當亦爲港紙漲價之因，惟華僑匯款是否減少，尙無統計數字，足資證明，但大量軍火及軍需品之購入，則無可爲諱之事實，是確足影響國際之收支，而與港幣漲價有連帶關係者也。

港紙漲價之原因，有如上述，以我個人觀察，若無確切有效之制止辦法，此種漲風，一時難有平息之希望，至補救之方，畧如下述。

外匯統制爲維持長期抗戰所必需，絕無可駁議，惟中國商人，智識淺薄，易受煽惑，故政府對於統制之意義，必須加以廣大宣傳，俾能深切了解，一面對於請購外匯之手續，及審查，務必力求簡捷，外貨之選購，予以較大之自由，使商人不至感覺若何拘束，緣過去各國之經驗過分之統制，每易激起逃避統制之意向，卒之發生相反之結果，同時外匯之統制不及港紙，尤爲外匯統制一大缺陷，夫港紙購買統制之困難，確屬實情，然若不有救濟之方法，則非惟統制之目的未能貫徹，且予狡

點者以擾亂金融一可乘之大漏隙，我人誠未可等閒視之也。

資金之逃避，完全由於一般富有者，但顧一己私利，不顧民族存亡所造成，七事變之後，我人耳聞目接，不少腰纏萬貫者，挈家人率妻子，乘槎浮海，爭向海外樂土，渡其奢靡之厲公生涯，轉移其資財存儲于外商銀行，以策萬全。此種無民族國家觀念者，既不出力，又不出錢，政府之于此等人物，應絕對不加姑息，當此戰事正酣之際，軍需之支出浩繁，其中多須外匯支付，爲充實外匯基金計，政府應於此時向各國宣布，所有中國人在外國銀行所存之款項，完全作爲中國政府在外國銀行之匯兌基金，由中國政府，對中國人之存戶負責，果能如此，富有者之資金，根本無法逃避，但此事須先商得各外國銀行之同意，始能辦理，否則于事仍屬無濟，而外國銀行之在我國佔最勢力者，當推英美兩國，我人如能獲得英美兩國之合作，自無問題，竊以長期抗戰，素爲英美兩國所同情，若我國政府堅決此種主張，與之交涉，想亦不難達到目的也。

挽救國際貿易之逆勢，最根本之解決辦法，仍惟有增加輸出，此或不免認爲老生常談，然事實確屬如此。抗戰以遠，名都大邑，相繼淪陷，敵人復隨處擾亂，使我對外輸出，頗受影響，故增加戰時生產

，應爲目前之急務，其在後方安全之區，更應加倍努力，使最後勝利，不至渺不可期也。

增加戰時生產，固爲目前急要之圖，而戰時節約亦有消極的重要作用，我人應減低生活程度，提倡使用洋貨之替代品，以期不必要之外貨輸入極力減少，其他如取締投機，稽查運銷私貨仇貨，原爲政府之職責，我人但望其更能積極進行，以保持金融之正常狀態，抗戰前途實深利賴之。

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統一戰線	殷佩
(評) 國民參政員的人選	殷佩
反對英日成立中國關稅協定	乘維
從「五四」學生運動說到三民主義青年團	余俊賢
論肅清貪污須建立中央政治密探制	何汝津
戰時計劃教育和十年工作問題	香棟方
民生主義的中和性	孔聖賢
總理遺教中的游勇戰術	任啓瑞
如何集中金銀正貨于國家	許越強
動盪不定的歐洲政局	任錫輝
戰時農村工作的開展	鄭秋華
抗戰中的西南交通綫圖	李杰
給一位熱心救國青年的信	姚德潤
(讀者園地)	

教育在抗戰時期究竟應該怎樣？

高等教育之部——自由解放運動（下）

劉禮貴

（一）

這些大學現狀之敘述和批評，已足使人壓悶了，究竟怎樣我們纔能趕上近代進步的大學之前程呢？茲先從基本改革問題談起。

關於大學的目的，猶其關於大學的「生活」，大約是因爲「現實」的環境之限制，遲滯了大家的思想活力，或者因地位上的尊嚴，挫敗了論評的勇氣，故大家不敢向前遠望，只好循循舊習了。但是，人類的「生活」如果缺乏一種「精神」，或不明瞭其「理性」，只是盲目的衝動，而絕不能有長足之進步。大學是志在養成專家的，不是鍍金的機關，不是照例入去四年，經過「等因奉此」般的手續，就可以「畢業」的。而且大學不單是爲青年人着想，同時要方便一切學者和教授們潛心專究之所。所以獨立研究和自由講學成爲大學的金科玉律。如果那一個國家運用政治或黨派手段而壟斷大學，鉗制教授言論，限制學生思想與行動，那個國家的文化就不能不停滯了。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不獨猶太教授受擯棄，即其本國教授也不能超出其黨部之意見而敢自由討論。所以純北血的教授們，如 Hartmann「精神」不能遺傳，只能

傳襲」的偉論，只能隱伏於希特拉的「血統

混合就是文化消失的文化種族論之下，而不敢在柏林大學談論，或准其門徒研究，「精神」自由和「精神」的本體問題了；Hier 也只好請了長假期去美國，留下柏林

大學的心理系變成荒涼怪狀，門塔羅雀；斯布朗格憤悶不過，也只好借機往東京逛一趟洩洩氣。這種現狀，德國文化再能邁往前進，恐怕很有限了。文化向上發展，絕不能受什麼阻碍，個人「精神」也只能在「自由」氣氳中方能滋長繁盛。所謂自由，不是那種懶惰懦弱者之所謂「我僅能翻譯，但不能創作」的消極行爲，也不是那些土匪式的自由，任意搶掠。她要我們自己積極去尋求，她也須要我們自己去覺察，所以她的 Sein 是 (nur sich)，不是 (an sich)（註八）。至於獨立研究，更是文化之正常軌道。如果我們的學者只能「取」而不能「給」，只能搬運而不能創造，自然只有洋貨而無土貨，只能做奴隸，而不能做主人。其實那些以螻蛄當爲己子，不過聊以自慰而已。我不知道，外人代建之海峽鐵橋，有誰敢誇爲真正我們文化產物？而套套化樣的實驗學校，能解決我們什麼教學上的困難？照樣抄襲的中學男女同學，不知犧牲

多少我們有爲青年的時間，精力和性命，也不知道怎樣摧殘了我們社會的純良道德。（關於這個問題，另章討論）軍事上的倚賴，不獨難於制勝敵人，還有易被客卿盜賣秘密之虞。學術上不能獨立研究，不獨阻礙了文化上進的前程，還會損害了過去文化的優良。因此，我極端反對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時髦戰時大學，也討厭那些販賣蓋有印章「文憑」的營業機關（學校）。若要訓練青年作救國運動可以另設特殊機關，若要發財可以開設商店，但若掛上大學的金字招牌，一定能給人獨立研究和自由講學之機會，纔是真正貨色，纔能有貢獻於國家，有利於抗戰。

理想的大學絕不能容納那機械的學分制，尤其在這制度下之熟讀課本背誦條文去應付那照例舉行之臨時考，月考，期考和畢業考等所謂考核成績工作。專門人才是「整個」的，不能強割成許多段落，而將肄業期內各學年所得的學分累積相加而符合預定之數量，就算畢業生能力之總和，就可以有資格做我們的領袖，或領袖候補者。況且「學無止境」，世界上也沒有幾多絕對真理，爲什麼我們一定強各年學生去記誦，而不訓練其獨立批評，自力研究去發明真理的能力？爲什麼一定限於四年級生纔能開始做論文（？）？站在學分制機械的下學生，只識養成懶惰倚賴，作偽，苟

且的習慣，以為學習是為應付教授的考試，而不是學生自己獨立研究的事業。大學有所謂留級，更使人覺得莫名其妙。那些主觀編排的各學年之必修和選修功課的次序，不知道有什麼客觀的根據？即實科中之必修的有機化學和無機化學的排列，在廣州的大學中也彼此衝突，先後不同，其餘文科更不必說了。每學年三種必修科目不及六十分（？）就不許向前研究，要強迫重習那厭悶無味的功課，有何學理上的根據？那些背誦式的試驗是否就可以真正考核學生的獨特能力？我敢說，學分制一日不走上斷頭台，中國文化永無光明燦爛自由之一日。我要替我們四五萬大學青年，為爭自由而高呼解放的口號，我們要給他們自由，纔能創造我們文化的自由。大學校長們，你們將一切功課開放吧，學生的選科不獨不應有級別限制，也不應有系別之差。他們每學期學習的志願和指導研究的教授之選擇，任由他們自便吧。（但較高深功課的選修之條件和限制，則由教授自定）從國家立場言，教授的講授，也不應限於學生纔有特權享受，他是全民的，應該公開的。至於畢業則不妨採取德國的辦法，側重於論文及口試。論文工作不能以翻譯代替，不許較剪主筆（註九）之抄襲。牠的主要訓練則在養成學生獨立批評，自由創作的精神，要學生自己搜集材

料（參考書越多，論文越有價值），要學生能洞察他所選習的「主科」中各種重要思想（或技能）之派別和優劣。關於畢業年限，只有最低限度之規定，不應有千篇一律的嚴肅酷刑，範圍各個學生之自由。

中國人從來都是重形式，講名譽，所以在自由解放的新式大學中，學生畢業不能不嚴厲考成，否則，就流為極端之放任了。主考者應是教育部所委任的正教授，應是嚴明不徇情的有道德之學者。至於學位我不贊成從「金元」國家販來的機械三級制，（大學畢業得學士，學士研究二年得碩士，碩士研究二年得博士）對於一級制或二級制我更無什麼成見。

科目的多少，不能影響於講學自由之原則。（太少也不行）自然，功課越多，分得越細微越好。教授擔任功課，因有相當選擇之自由，也不致於敷衍塞責，而免強去擔任非其特別擅長之科目。況且現在華北華中失陷，許多著名教授正患失業，禮聘來校，不獨可以擴充課程之內容，還可以免除實行講學自由而學生無特別科目可選之弊。至於課程應該怎樣增加合併，那是非這短文所能討論詳盡的。

大學教授我不贊成由留學生包辦，其選任我也不滿意於全由校長經理。「本地不練」，留學生自然有許多新鮮風味。但是，各國學制不同，訓練也有深淺之別，

即同一國內也有許多程度差別之大學，即向同一大學考取學位，其主考教授也有難易之分（德國就是其例）。如果用這種有奶便是娘的便宜辦法，只顧虛形，而不問內質，去選聘教授，自然有濫充之弊，自然會誤了我們無許有為青年的前程，影響我們文化的前進了。

現在中國無論那種學校（大學、中學、小學）多是先找一個校長，再由他去聘請教員，由國家委任教員而為終身職位的，直至現在我們仍未能實行。這樣，校長的職權和責任太重太大了，儼然是政治上的獨立機關。他不獨可以自由支配教員，還可以超了教育範圍而訓練學生為某種利己特殊行為。教員為保持自己職位上的安定，有的不得不將自由平等的特權，降為諂媚逢迎的卑劣。而一切行為也只好以校長的意志為意志了。教員為求職位之獲得，少不了時常鑽營權貴之門，奔走於各種會社之間，於是教學則變為敷衍塞責，深入的研究則改作輕浮的「應時小賣」了。況且每逢學期或學年交換期間，教員中必有一度之恐慌，明知從稅糠中尋不出白米，為什麼要使社會常患週期之熱病？雖然校長教員中高潔清廉，學問豐厚者大有其人，但這種一人包辦制度不能不說有百弊而無一利。自由解放運動中的高等教育，大學校長的職權必要減削。所有教授的選

委及調動，應由教育部掌握。為慎重起見，教育部可以組織特殊委員會，網羅全國道德學問足乎眾望的學者，充任委員，作公正之審核及建議，而由部長提交於行政院會議通過任命之。（教授的撤職也須經相同之手續）。至於教授任期，當以終身職為最理想。

教學法，中國教授幾乎全用演講式，討論會(Seminar)即鳳毛麟角。演講，可以直接灌輸學生知識，指示該門功課研究之趨勢和各種派別之利弊。但這種工作只是向內，學生僅能吸收客觀精神和簡單客觀化「精神」，而未能訓練其獨立批評，自由創造的個人「精神」，也缺乏了直接體驗教授治學方法之機會。為補救這個缺憾，歐洲進步的大學多有討論會之設，以備師生問難。這樣，學生錯誤纔有一個當面糾正之機會，不致迷途太遠，混亂不清。至於演講，則應由學生自己紀述，不應照例發放那些編輯而成的講義，養成其倚賴習氣。有人譏笑中國大學是中學式的大學，其教學法與中學無異，其辦學方針也有許多與中學同，這句話很值我們反省的。

中國大學無論入學，轉學及在校都要經過無許。格之試驗。考試在是近年來中國教育獨有的特徵，現在不獨學校內有許多考試，學校外連僱一個書記，或一個店

員，也來登報招考（其實是借名作廣告）。考試，無論應用極「密」的題答法，或測驗法，極其量只能考其現有獲得的成績，或只能使學生背熟各種「則條文」，但不能觀察其獨力創作和處理事態的真正才能。所以那些高等文官考試，其形式上也只能近於「科舉」了。而且應用這種形式試驗，絕不能提高學生程度，也不能養成學術文化上的新精神。如果應用考試來做束縛學生研究的馬，那更可憐了。大學投考學生，每個一定會通過原校畢業試，及教育廳主辦之會考，理論上應可以自由向大學升學了；但是，我們無論公立大學都在那酷熱夏天，要他們吃吃苦，參加那所謂擢拔英才之入學試驗。理想上，我主張每省

只有大規模的大學一間，所有曾經通過中學嚴格畢業考試的畢業生（怎樣纔是嚴格中學畢業試，待下次討論）皆可入校註冊做正式生。目前我們要達到這個理想，恐怕比抵抗日本之侵略還困難百倍。為權宜計，各校的人學試驗應該盡量放鬆，以免人時困難，出時（畢業時）容易之弊。轉學及借讀，更應充分通融，以疏導學術閉塞之淤流。

大學行政的監督，直接由教育部操縱，但中國如此遼闊，執行上因地域之不同，自然有輕重之別。近於中央政府的大學，因地位關係，即不監督，也不能不認真

辦理，離中央越遠的，其控制能力則越小，以至鞭長莫及了。雖然每學期教育部可以派督學前往觀察，但後者的權能每因種種關係，對於大學實在未敢有何動作。如果照以上辦法，大學中基礎的教授及院長之選委，教育部俱有支配調動之權，校長權力自然減低，整頓洗刷，自易着手；而那種黨同伐異之陋習，自然易於革除。

中國學術落後，恐怕無人敢否認的，為急起直追計，我贊同借助於客卿。猶太人現在正受排斥於西歐，我們若能擇要重聘其來，也不是無補於我們文化的前途，雖然猶太商人是討厭的，但其學術界泰斗確能使人欣仰。

戰爭要為一切生活之中心，高等教育又是我們文化最高的領袖，其需要服務戰爭更不在話下了。所以，四五萬的大學生（因戰爭故，人數更少）和近萬的教授，不能坐在象牙高塔而不顧我們塵世紛擾，也不能以「目的自由」(Purposive)的行為而置國家意志於腦後。因了兵役法，雖然他們可以暫時延緩參預預備兵役；但戰爭上的向人才實在需要他們方能勝任愉快（例如，計劃橋樑道路之修築，化學戰上的配製和預防，民衆宣傳和組織之秘密設計等等）至於所謂自由參加，不是那種消極的不參加，也不是為了物質關係而受迫的舉動，應該以康德的倫理學之「範疇」命令

舉動，應該以康德的倫理學之「範疇」命令

去積極自由選擇。爲便利討論計，我分校內研究和校外工作二部分。

無論校內特種研究或校外抗戰工作，不能任各校自由行動，凌亂無章，高興時則高呼落鄉，厭倦則回校上課。其實，這樣只能擾亂熱鬧，於抗戰影響極微。全國現在所需要什麼抗戰人才，恐怕只有最高軍事機關之軍事委員會纔能知道，假若校內所設立特種訓練班，而不是爲前線或後方所必需者，豈不是白費苦心？至於研究和抗戰工作的分配，也只由最高機關酌量各校設備和能力妥爲計劃，方不至有重複或缺漏之弊。

大學不能停辦，一切專門功課，也不能取消。如果以增加戰時功課，如化學戰爭，兵器研究，中日問題研究等等選修科，而爲裝飾戰時高等教育門面工作，只能累增學生知識，但未能切合抗戰急需。教育部近頒發之一高中以上學校學生戰時後方服務組織與訓練辦法大綱，命令各大學，將各種實科功課（如機械、電機、土木、化學工程、醫藥救護及駕駛等等）加重訓練，或酌量增設訓練班，也只是和實際需要相離的工作。我以爲，大學就是戰時所遇一切困難最高研究機關。假如前線感覺着抵抗敵人的唐克車尚有問題，軍委會可以指定某某大學對於兵器，機械，或物理有優良之設備及人才者組織研

究班，詳細分析研究，假如宣傳和訓練民衆之辦法尚有未妥，則可以指定某教授之政治、心理、教育、哲學等系作週詳慎密之聯合研究。我們知道，歐戰時的德國因空氣中取氣之方法。如果欲實行真正全國總動員，一切專家都必爲服務戰爭而研究，必須受軍事機關之統制。

在校內，要作研究工作；在校外，則爲實行與救國活動。這二件事不應由同一人同時兼職。不獨一心二用，不合心理學上的「注意」原則，即從效率言，這兩者也不討好的。研究，不單是上課室聽講就可以成功，也不是一個東飄西忽的交際家所能勝任。救國活動，在前線者則應專心致意對付敵人，衝鋒陷陣而殺敵致果。即在後方一般人以爲很平凡的抗戰宣傳，也不能呼幾個口號，做做街頭劇，敷衍的演講等，隨便去要要，所能奏效。他同樣需要專門人才，特殊技術的。所以半日讀書半日做救國工作的辦法，不獨學生負擔不起，即大學教授也同樣不可能吧。離校幹救國事業的，現在有軍政部，訓練總監及教育部台定之一高中以上學生志願參加戰時服務辦法大綱」可以跟循，我不必談論了。在校的學生也不應救國自甘落人後，而作壁上觀的，長期的暑假大可以利用担任後方工作，平時在校則須參加晚間如德

國國社黨「挺進隊」之訓練。（註十一）不經過嚴格訓練而冒昧從事，不獨無裨於救國，而且還有害於救國的。

突出易爲人注目，平凡則易使人遺忘。台兒莊之勝利，有幾許人能知道東戰場和北戰場之牽制，也是不可思議的。這其中之一呢？教育是太平凡了，但也不能以其太平凡而至於被排斥吧！一八一〇年柏林大學讓生於普魯士衰敗而全邦大學損失待盡而只存有三間之時，但這一二百二十餘年來這間首腦大學對於德國文化的貢獻，對於德國有關戰事上的一切之支持，恐怕德國人無不推崇吧！即在歐戰時這間大學也贈了學生九百九十七名和教授三十七名的頭顱給他們的祖國呢。（註十二）這個例子很可以使我们醒悟的。我認爲，我們也須一個新大學的精神，纔能負起現在和將來國家一切巨任。

註九：請參閱「廣東義務教育」第六期拙著及軸心第二期之一「戰爭可爲一切生活中心」。

註十：鄉間有的新聞紙因交通及經濟關係，所有重要新聞只能從隔日之省城報紙剪裁編排而成，這樣的總編輯名爲較剪主筆。

註十一：挺進隊，德文爲Sturm Abteilung，簡稱S.A.爲國社黨武裝黨團之組織，大學生參加者很多，因爲他們日間須上課或研究，故改由晚間舉行訓練或服務。

註十二：見 M. Lang, "Die Universitäten Berlin" 1931 (本文不准轉載)

抗戰期中的輿論

馬光揚

1. 輿論的重要

社會的行動，無論個人的，或社會整個的，都受輿論之支配。輿論東指，動作東行，輿論西指，動作西行，換言之，輿論爲動作之指南針與發動機，失了這指南針和其發動機，就是最偉大的人或是最高明的策畧，都不能驅使社會前進，且必致民衆之反對。

哲學家 Taine 先生這樣說：「除獲得輿論之擁戴以外，統治者則無法以自持，偉大之勢力常操於被治階級也。故政府祇能建築於輿論之上。這種輿論主義，已滿佈於民主國家或最專制國家，或甚至軍人專政之國家裏面了。羅馬皇帝雖能驅使其人民如殘忍之禽獸以反抗敵人，但其首先至少要尊重其民在輿論上領導其羣衆。」這是說明輿論的威力超越一切。

輿論不但是有這超越的威力，而且還可以堅強我們對某事件的觀念，可以增加個別行動的力量，也可以組成一最有力量的陣線，同時還可以加速成功之效率。我們做社會運動的工作，整個政綱固然要確定，而輿論之統制，却還是我們的首要課題。至若在抗戰期中，製造輿論和統制輿論，當然更是不可忽畧的工作。不然，

人民的信念就不堅，步伐就不齊，陣線就不強硬，政治就不安定，以至社會一切非常設施，就不靈活了。

2. 什麼是輿論

有人說輿論爲各種社會心靈的表現之一部，或爲各個人共同思想共同願望和共同感覺的習慣之一。但這與一切社會羣衆心理之表現或各種之民意的解釋，都是混在一起，我們總找不到清楚的釋別。據各學者的見解，大約，輿論就是：人羣經過理性之感動，和合理之商討，對某一民衆問題之解決而所下的評判 *Public Opinions* 教授這樣說：「輿論是理性的人羣對於公共利益事件之評判」(見社會學原理一三八頁) (Cooley 則稱之爲「受鼓勵的，適應的和有機的人羣之評判」這裏，我們在「輿論」與「種種心理的表現」之間，已認清楚他的不同之點了。肯定的說，輿論不是街道上暴衆之狂吼，不是個人之憤怒，不是羨慕和憎惡的情緒，也不是易引誘與無知之暫時的民衆信仰，同時又高出於普通之民意與普通之評判，故亦不是普通民意或普通評判。經過豐富而經驗之計劃，經過成敗得失之分晰，或種種結果之考慮，而構成之社會的評判，才是我們所謂輿論。

3. 輿論的構成

輿論之構成的因素，(1)是民型(Norms, of the People) 風俗習慣等，(2)是不滿之變。

新的時代有新的民型風俗習慣，自然也有新的輿論，因爲新時代的環境，充滿着新民型，新風俗，新習慣，和新思想，由這環境產出的輿論，當然也是新輿論。這是說明，輿論的本質，因時代環境而變遷，因民型，風俗，習慣，和思想之變遷而變遷。在歷史上，我國被異族侵入者許有多次，然而習慣上舊時代民衆，以任何異族之侵入，不過是改換一朝代，并無經濟的侵畧，也無消滅種族之野心，結果，祇有所謂「無論誰人做皇帝都要納糧」，決沒有今之所謂「民衆動員，爲民族存亡而抗戰」的輿論。至現時代就不同了，我們民衆受過三民主義之訓練以後，所謂爭取國家民族之自由平等，已成爲現在普遍的典型思想。在這環境而遭逢異族之侵略，自然，舉國一致而爲從來所未有的「長期抗戰」的輿論，就從此而發生了。至於所謂「無論誰人做皇帝都要納糧」的輿論，在今日新時代裏，猶其是有三民主義領導之下的前進社會裏，自無立足之地。

上面所說的民型，風俗，習慣，是其構造之質，而不滿之事變，則爲構成之因，故因目前之時艱，而生出種種批評之意

見，這就是輿論發動之點。不過，由事變而卒輿論之完成，總要經過三四階段的歷程：

(一)自信力之表現——對於不滿事變，

自信民衆結合起來必有補救和改良的可能，這自信力，可算是輿論的播種，若果無自信力之民族，或無知識與迷信之民族決不會有輿論之產生，沒有輿論之民族，必在淘汰之列！就水災事情說來，我們若信認水災，爲不可避免之妖禍，爲懲罰世間一切罪惡的所致，那末，祇有忍受其懲罰的痛苦，沒有所謂治水的輿論，更沒有所謂治水的動作了，這樣，豈不是常罹於水災，而終死於水！再拿抗戰來說，若果我們常染着『三亡亡國』的恐日病，那當然沒有抗戰之輿論的發生，因之亦沒有抗戰的發動，祇任日人之宰割而已，這樣一來，民族豈不是從此陵夷！但若果我們自信有防水之能力，則防水的輿論，就由此觀念而產生，防水工作亦從此而發動，結果，有脫離水災之可能；我們對日本之侵略，有抗戰必勝之自信力，就有抗戰的輿論，繼之就發動抗戰，將來必致民族復興。

(二)重化的認識——民衆由於直接合理化的認識，或由於適當藝術之宣傳的感動使事變——重的深印於腦海裏，發而爲熱烈之同情，這是輿論種子萌芽時代，在民氣消沉的社會裏，民衆既無加重化之認

識，必無熱烈之同情，與緊張之運動，自無輿論之發生，這種消沉現象，在國家，則爲敗亡之狀兆，在社會事業，則爲落後之象徵。

(三)由第二階段踏進第三階段，是由加重化之認識而入於多方——的時期，也是輿論種子發芽以後的灌溉時期。在報張上和在各刊物上，對於問題的先前輿論，我們各就利益立場，發爲主張，益以精妙顯現之宣傳術（如報紙上之大字標題）或漫畫、標語、口號之運用，冀獲得主張之實現，這是第三階段的現象。由這種的商討而達到一決論，這是輿論的最後階段，或稱第四階段。

4. 輿論的統制

首段說話已說明了輿論有不可少的且有超越一切的重性。因其重要也，故有統制之價值，猶其是在抗戰期中，輿論的統制，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特殊効力。因戰時政府非集中全國財力，人力、物力、不足以應付時艱，而非使民意如軍隊一樣的集中於訓練官之手，教以嚴肅的立正，威風的禮儀，齊一的步伐，則又不足以言總動員，若非統制輿論，則更不足以言民意之訓練，故要總動員——物力財力人力總動員，必先要訓練民意，要訓練民意，必先要統制輿論。

說到輿論統制，必先從言論統制下手

，所謂言論的統制，一是言論的檢查，一是言論的宣傳。在前者一方是壓抑一切有利於敵人的言論，另一方面是壓抑最高長官所要壓抑的一切言論，這是基於對外要一致，對內要統一的原則；在後者，一是正義與事理的宣傳，如戰爭的意義，戰爭的收效和獲利世界各國之同情宣傳，一是民氣與情感的宣傳，如用鼓舞和踴躍的方法，她的特性是喧嘩的，是熱鬧表演的，是感動的和令人驚目的。這是戰時宣傳的原則，是統制的方法，至於統制的工作和組織，則須有最高委員會專司其工作：

- (一)新聞部：宣佈和檢查軍政與內政新聞
- (二)教育內政部：發行關於戰時教育和政治的小冊子。
- (三)演講部：高低級的演講比賽或鄉演講。
- (四)影片部：製造有宣傳意義的影片，和檢查反宣傳影片。
- (五)美術部：製造宣傳畫
- (六)外國文宣傳部：印發外國文報紙或小冊子。
- (七)發行部：發行各種宣傳品
- (八)婦女工作部：婦女工作的宣傳

這工作組織大綱，可分爲中央與地方的，但以有適當系統爲佳。這裏祇論其綱要，不能詳細輿論。

徵收貪污財產充實抗戰力量

鄭鍾仁

敬以此文獻給賢明的當局并獻給諸賢明的財政專家！

我們要抗戰，爲的是爭求民族的生存；我們要籌劃戰費，爲的是發動抗戰的力量——這已成爲天經地義了。

戰費的籌劃，專家們議論紛紛，但是按現在我們政府所措施的，除了借用外債以外，顯然是以發行公債爲其主要的來源，而以整理租稅，增加收入爲輔，這在理論與事實上，都是值得我們贊成而擁護的，我們姑且不說許多學理和舉出許多歷史上的外國的先例，好像說歐戰時英國七十餘億鎊的戰費之中，公債佔八成，以及法國的一千五百億法郎之中，公債佔八成以上等等的例子，我們單就事實上來說，已經知道一種辦法是對的了，因爲目前除了發行公債以外，再沒有什麼其他更妥善的收入可作爲戰費的主要來源。

不過，自從「救國」和「國防」兩種公債推行之後，我們誰都會直接或間接地聽見民衆們在踴躍認購之時，附帶來了中止目的批評：「我們購買公債是甘願的，不過那些有錢存在外國銀行的人們，不應該強迫他多多購買嗎？」或是：「公債我們是應該購買的，但是對於許多扒了錢的官僚們

，不應該迫他們將全部或一部的財產拿來購買公債嗎？」這些話，就算我們並沒有聽過，但是我們在意想中也可以推想出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使有錢出錢的原則實現得更公平，我們要使民衆們心悅誠服而更踴躍認購。

據陳嘯江先生的「我們怎樣籌劃戰費」的演詞中（二月廿二日廣州播音台廣播見載「中山日報」），他所主張的十四款目，原則上是應該贊同的；它的第一款「創辦新稅」中第一項的「財產特捐」，自然是在我們使「有錢出錢」的原則公平實現的時候所要注意的，正像千家駒，丁洪範等專家早就注意了的一樣。但如丁，千兩先生所主張的是：「就國民所有的財產多少，而強以累進率的捐輸」，這當然是極公平的辦法，但是，推行不易，相信應該暫慢一步實行。而這時，我們應該急迫實行的是一個更有效的更能使民心悅服的辦法——徵收貪污財產！

每一期的「軸心」帶給了我們大批的「貪污史料」，難道我們不會從這裡起了很大的感想嗎？我想：貪污者在今日這漸上軌道的政治中，有人檢舉，有法懲治，但

在這段統制輿論的說話看來，或許有人認爲我的主張是殘廢言論出版之自由。其實不然，在客觀方面看，我們所謂自由，是我們應負的責任，並不是不受任何拘束，例如我們在漢民路上不停的前進着，這是我們的自由，也是我們的責任。若果我們在路線上繼續的停留着，那末，這是阻礙後來的八萬羣衆的前進，這是剝奪了他們前進的自由，在我們，是未負前進的責任。故停留於路上，並不是我們的自由，而是其阻礙公共的秩序，受前進的自由，亦非所謂可以隨便說話，妨礙風化，與搖動社會之福利而不利，乃以不搖動社會的福利爲限度，猶其在戰時，言論自由當以整個民族利益爲範圍。若言論而越過這範圍，就是危害民族，就是未負發言之責任，故爲戰時社會福利計，爲民族前途計，言論必須檢查，輿論必須統制。

國家總動員畫報

是中國唯一的漫畫日刊

灌發 輸揚 抗民 戰族 智精 識神

本刊特色

言論正大 文畫通俗 編排新穎 定價低廉

總經售處：廣州光復中路九十一號
中南書報流通社
社址：廣州市將軍前路南七號二樓
國家總動員畫報社

是難道我們就輕輕放過以前的吮吸民脂民膏的敗類嗎？我們要使有錢者出錢，難道不可以迫令這班倖人濫人的敗類多出一點以至於盡出我有嗎？這些問題向着我的腦海進攻，或許同時也向着我有同感的人的腦海進攻。於是，我主張：「徵收用貪污財產。」

我主張徵收貪污財產，我相信不需要提出更多的什麼學理上的根據，更不須要照例地舉出些世界各國之先例；正像我們不再需要解釋「我們為什麼要把敵人趕出領土」的道理一樣，徵收貪污財產，已經是再不需要談根據與理由的事了。不過，我們這裡所要討論的是：貪污財產的定義，貪污財產徵收範圍，和牠的徵收方法，以及其結果的預測。

這裡所說的貪污財產，下一個淺白的定義時：「過去或現任的貪官污吏扒到括到的財產」。

這個定義固然是可以毫無疑義，但是在徵收的範圍中我開頭就感覺到困難，因為，我們敢相信：都市裡的許多富麗輝煌的洋樓和鄉間幾多肥沃饒實的地至少有半數以上都是貪污財產，幾多工商業的股票和幾多鄉下向利貸放款也是貪污財產；這些固然可以在徵收範圍之列，但是當我們在着手調查這是否是真污財產和調查其實詳細數目，以及在徵收時候的技術上，

着有許多枝節的困難；這當然並不是說絕對沒有辦法，但是解決這個困難的辦法實在有待於各專家的詳細研究。假如我們對貪污財產的徵收範圍能夠很順利增至如是廣濶，那不但是我們在歷史上所表現的奇蹟，而且對於抗戰力量的充實更有意想不到的補助。

所以，我以為初步對於貪污財產徵收的範圍，應以寄存在外國銀行中的為標準。

說到這裡，當然會引起「深思的賢者」的一點誤會：「難道做官的和做過官的人就不應該有錢嗎？怎樣可以說寄存銀行裡的就是貪污財產？」這話是對的，當然做官或做過官的人在正當的方面極有存錢在銀行裡的可能，而且，勤儉儲蓄之風在公私兩方面都值得稱讚，假如他們的錢是儲蓄在本國銀行的話；但是，這種積蓄的存款大抵是較小的數目，這實在是普通的情形。除了另外經營工商各業或其他正當的特別事業以外，一個腰纏十萬的做官者或做過官者，鮮有不貪污者。高信先生在他的「紀念黃花節之偉大意義」（見本刊第二期）一文說得好：「我主張：如果有五萬元以上家財的人，一律要開除黨籍，（如果他的做生意的人，當是例外）因為我相信，做官在一種經常費狀態之下，是不會有五萬元以上的家財的；」所以，我以為

我這種主張，必不會把清廉的人冤枉。當然，此外我們在徵收的時候，又要在技術方面有極審慎地進行，我們自不應把有些勤儉積蓄的錢，當做貪污財產。

這些寄存在外國銀行中的貪污財產究竟有多少。會不會徵收起來「所得極微呢」？這裡雖然缺乏數字的材料，但是據些人的估計：中國人在外國銀行中的存款，如果抽他百分之十的稅，至少至少有一萬萬元（手民並沒有排錯，是兩個萬字。不過，這個估計的人，胆子還是太小了），隨便叫一個孩子來算，這個實數究竟是若干？真怪不得最近香港政府的報告：數月來香港的煙酒稅收比前增加三分之一；又「不得」美國最名貴的絲襪，在香港已售至絕市，以現在已拍電赴美，趕運大批應市「啊」（以上事實見於「中山日報」四月廿九日副刊「閒話香港」一文）既然有大批的錢寄存外國銀行，此時不跑到租界，香港或寄往外洋去大化特化，更待何時？這班在租界，香港或是外國大化特化的人，據非正式但并非荒謬的調查，十分之八都是扒到錢寄存外國銀行裡的大小官僚們，這班吮吸民脂民膏的敗類把「括」和「扒」的結果接拿到外國銀行去，使國內資金枯竭，直接間接造成國民經濟陷於總崩潰，而使中產階層國民，變成無產，無產階層的國民，死填於溝壑；（高信先生在上引一文中所

說的話)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時候，還在醉生夢死地大化特化，這種入出皆不合乎「義」的財產，就算徵收起來為數僅極微極微，也應該實行徵收，以使民衆悅服，何況實際上的數目并非「極微極微」呢？

當然在這最低估計中的寄存外國銀行的十萬萬元并不全都是貪污財產，而一部分是商人或是其他用正當途徑發財的人的積蓄，但是，我們可以將這筆款項加以一個很低的折扣，六折，即是說，存在外國銀行裡的貪污財產，至少至少一因為寧可估計到至少「有六萬萬元。但因為這些貪污財產既然寄存在外國銀行裡，而它的所有者又多在外國，那麼，在徵收方面自然有相當的困難，但我們盡可以用外交的手段來打開這些困難。因為，更困難的「抗戰建國」的工作既已要幹，那這較小而又小的困難我們當然不要迴避。而且在徵收的時候，我們應該相信不致發生若何困難，因為英美諸國在「七·七」戰前既然能極力幫助我國法幣政策的鞏固，這一次存款的徵收自然是不會使他們感受如何過大的困難；雖然他們所以幫助我們法幣政策的成功，是憑着自己直接間接的利益，但是我們這次設法不使他們有如何較大的害處，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是有成功的希望的。

不過，對這些貪污財產無條件地徵收自然會更困難；而且，名義上用着「貪污

財產」這等字樣自然很容易使它的所有者發生更大的反感，那麼，我們就想一個更好的辦法罷，於是，我主張：

(一)先切實設法調查中國人在外國銀行存款的各個存摺的數目，將存款在五萬元以下的除外，凡每摺在五萬元以上者，加以處理。但如果一人或一個家庭的貪污資產寄存在二個或二個以上的銀行的時候，應該併為總數而後計之。(下面第四項主張中關於購債比率之計算，也適用此例。)

(二)有五萬元以上存款之戶，除掉已經確知他是貪污財產之外，餘者分令其將存款來源具報；如果是由經商或其他正當途徑得來的，必須提出相當的証據。然後將所有的具報與證據加以詳細地審查。確定某某等之一部或全部為貪污財產以後，即又加以處理。(當然那些五萬元以下者以及由正當途徑發財而來的存款，我們也可以用更客氣的名目徵他一點稅率很輕的稅或是什麼，但這些不在本文論列。)

(三)對於這些貪污財產或可不必取無條件的徵收的手段，而可代以「強迫購債」的辦法。可由國民政府發行「殷富特種公債」(或其他極客氣的名稱)強迫「貪污財產」所有者之認購——此時與論儘可不必譏其為「貪污財產」，反而應該監督，促迫或甚至於鼓勵其購買。

(四)各戶認購之數，似難迫其以存款之全部，而應以累進之比率計其存款之一部以至大部作為購買之數。累進之比率或可如下：(甲)、貪污存款在五萬元以上不及十萬元者，迫令出其全數之十分三購債。(乙)、十萬元以上不及五十萬元者十分之四。(丙)、五十萬元以上不及一百萬元者十分之五。(丁)、一百萬元以上不及五百萬元者十分之六。(戊)、五百萬元以上不及一千萬元者十分之七。(己)、一千萬元以上者十分之八。

(五)違不購債者，予以輿論上及法律上嚴厲之制裁。

(六)切實依法購債者，政府及輿論可以作形式上之慰勵。又假為「貪污財產」的所有者之中有的是現任官吏，那政府也可以本寬大的精神，不加追究或處罰，這當然是我們的一種手段，使他們在補償他們的罪過的時候，得相當的出慰。不過千萬注意：這和「鼓勵貪污」有別。

(七)該項公債，不給利息。還本時期，可俟至國內各項公債都清還以後。

以上七項，自然是原則上的大體的主張，詳細的立法以及推行上的許多枝節的技術，自有待於專家的切實計劃。

說到這兒，一定有些「深思的賢者」恐怕會「因此而破壞全國精誠一致的陣容而生出許多騷擾」，其實這儘可不必過慮，

日本從軍事失敗到經濟危機之路

任穎輝

一、日本戰時經濟基礎動搖了

近代戰事的特徵，不祇是海陸空軍的對比，最主要的是財政力經濟力的持久戰。第一次歐洲大戰時，各國所預定的戰爭期間為七個月，結果竟出于意料之外的延長到四個年頭的長期戰，戰費的支出便成爲各國最難解決的問題，英國支出於歐戰的戰費爲七一九億元，德國爲六六六億元，法國爲五七一億元，俄國爲五五五億元，美國雖是最遲參戰却亦支出四六一億元，歐戰時戰費支出的浩大不難想見，何況今日的戰爭已經是進一步的新軍器和全國力門比的戰爭，所需軍費當然比歐戰時要多幾倍；同時亦說明鞏固戰時經濟基礎，實爲保證戰爭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興起不過是明治維新後短短六七十年的歷史，在土地與天然資源缺乏的條件下，經濟基礎必然是極其脆弱的，諸種重工業很不容易充份發展，現在戰時的戰費籌劃與至軍需品的補給實在是很成問題的。

中日戰爭以來，中國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決長期抗戰，不斷的消耗日本的軍力與經濟力，使日本疲於應付，一天天走

到困境。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已達十個多月，它所支出的巨量戰費，三十億元，

之中有二十八億元是單靠發行公債而來的，依據世界戰爭所得的教訓，凡是戰時財政只靠公債或租稅來支持的，必不可避免的引起通貨膨脹，可以很清楚的認識日本經濟的危機深刻化。事實上，日本目前因爲不斷的增徵租稅和發行公債的結果已經使物價急速度騰貴，國民生活感受極大的威脅，而至不能忍受的程度，漸漸的從潛伏的將爲表面化，反戰思潮亦伴着日益增高，一般日本大衆所最關心的已經不是皇軍的勝利，而是日本對華戰爭究竟什麼時候會停止，以此責問政府。即侵略的代理人近衛也不敢再發打到中國屈膝的荒謬言論，那些急進法西斯軍人，和自命中國通的外交家川越大使之流，也失掉了對華戰爭勝利的信心，一變論調，籲請其國民覺醒支持長期戰爭，這些都充分地說明了日本由於經濟危機和軍事上的失敗，開始搖動起來，泥腳是陷落得更加深了。

一般外國政治家和經濟專家，對於日本兵力的強大是承認的，但他們却一致的指出日本的最大弱點是經濟的貧乏。去年十月廿一日英國議會中，勞勵黨黨首宴多

因爲貪污財產的所有者不過是全國中極少數而又少數的人而已；雖然這班人的勢力大，爪牙多，但是我深信在法律與輿論之下，他們不會有什麼「通天本領」的。

現在，且就存外的貪污財產是六萬萬元的數目。那個小胆的估計所折扣來。數目——來說，我們假定這筆存款者共有一千戶或至一千戶以上（因爲這裡沒有可靠的數字足資參攷，所以，在不太荒謬的範圍內作一種假定）而我們又假定各戶的存款的數目是如下：（一）、存款五萬元的（假定恰恰是五萬元）有陸百戶。（二）、十萬元的四百戶。（三）、五十萬元的一百戶。（四）、一百萬元的八十戶。（五）、五百萬元（四）一百萬元的八十戶。（五）、五百萬元（四）一百萬元的八十戶。（六）一千萬元的二十戶。那麼，照我所主張的累進比率計算，就有三萬萬九千八百萬元。這一筆款項說他少并不算少，但是我們既經過。多困難才得到這筆款，所以也就不算它多；不過我們不應該僅僅注意這筆款，而應注意徵收這筆款之後所生的效力，我們可以預料的至少有兩方面：（一）民衆們看見精明的政府對於「有錢出錢」的原則推行得如此公平，大家更加心悅意報地爲國効忠，當兵的踴躍從征，捐輸的爭先解囊。不說廿七年度「國防公債」是萬萬元，就算十萬萬也敢担保旦夕銷完的；不說往前線殺敵，就算赴湯蹈火，連那最長進如阿之類也都競爭參

利氏演說，謂日本經濟狀態極為脆弱，假如英國政府採取相對地中海一樣積極的行動，維護遠東權益的話，日本決不敢毫無忌憚地進攻中國的。在同議會中自由黨辛克萊氏，也指出日本輸出的五八，二%是在英美兩國的，假如此等國家對日本採取了最後手段，實施抵制日貨，伴着其他好多國家也要做行的，日本的經濟必然大受打擊，陷於崩潰的狀態中，無法以支持其長久對華侵略戰爭。夏多利和辛克萊的話，自然是有所根據而發的，可謂一言播中日本的癢處。

二、日本經濟底柱石的生絲市場底衰落，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日本主要的輸出品不是棉花，而是生絲。日本原是不產棉花的，它的棉織物出品，乃向外輸入棉花，加以製造，再以成品輸出，於其中獲取若干資本與努力的贏利品而已，至生絲實為日本的柱石輸出品，且特此以平衡其輸入的差微。中日戰爭以來，單在去年下半年，日本生絲市已大形低落，據日內瓦方面的可靠調查，日本生絲的出口，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較一九三六年同月低落到近百分之四十，確數如次表：

年 月	售貨(包)	存貨(包)	寄出(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五七,一五九.五	二二,三三六.五	六五,一八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四五,一〇八	二三,九一三	四二,六一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四一,五六五	二六,三〇八.五	三九,六三一

同期中，日本絲市的平均月價，跌過了百分之二十。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為八六九.五七日元，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已落到七一八.七〇日元，在十二月，更減到六八六.九八日元了。

研究日本問題的職權尤特勒女士，在其最近所發表的「日本對經濟制裁的恐懼」一文中，其警句有云：
「日本對美國的貿易出口，生絲實佔

百分之八十五，這些生絲是完全由日本供給的，並非由他國入口而轉運到美國的，的確，日本的整個社會，都建築在美國的絲市場上……」
又密勒氏評論報載稱：「美國去年頭十個月輸入的日貨，為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六萬八千元，生絲佔八千四百七十四萬一千元，達日貨輸美的半數。」
像上面指出的幾個日絲低價與市場冷

加。(二)中國的政治上從此就會少見的事發生；未來的貪污者看見過去者的究竟如此，他們至少也不敢樂為的。我想：從此本刊再要搜集些「貪污史料」也不可得。
這一筆不算十分大的收入却有着這大的意義，在直接方面對於抗戰力量的充實，雖不見得如何偉大，然而間接的影響，却是不可思議。希願賢明當局注意及之。

請閱華南唯一之一！

廣州日報

本報言論 透關精詳
戰時消息 快捷異常
新聞豐富 副刊優良
編排印刷 確具特長
廣告效力 到處稱揚

目	價	
	壹年	半年
一個月	國幣柒角	國幣肆元
郵費	國內每月一元	每月六角
國外	每月一元五角	每月八角

社址：廣州市光復路二二七號
電話：編輯部 一八八五
營業部 一八二二

淡的事實，顯然是因為受了國際間普遍性抵制日貨影響是必然結果。

日本絲存輸出貿易上，已據有杜石的地位，目前在戰時中，市場幾被杜絕，這一影響是很大的，不祇是日本經濟基礎上受一大打擊，且使從事養蠶的農家，和依靠製絲業以維其生計的多數人口，必然要遭受到失業或低減工資的痛苦，而引起反軍閥反戰底思潮的。

三從軍事冒險到經濟危機

中日戰爭到目前為止，日本已消耗了三十萬萬元，平均一天消耗達一千三四百

(以百萬日幣為單位)

國民收入	軍事開支	佔國民收入底百分比
一九三一年	一〇・〇四三	四・五
一九三二年	一〇・二二九	六・七
一九三三年	一一・四六九	七・六
一九三四年	一二・〇二九	七・八
一九三五年	一二・四八二	八・三
一九三六年	一三・一〇九	八・一
一九三七年	一三・七六三	三〇・〇

非常明顯的，像這樣浩大的戰費開支，而不生產的消耗，勢將醞釀着極嚴重的困難結局。這並且說明日本軍閥此種軍事的危險，不祇是反對中國人民，佔領中國土地，而且也是反對日本人民，剝削日本工人和農民底利益，即小資產階級也深受其害，最多使軍需工業者多得一點剩餘價值

萬元之巨，加以東西北各戰線的延長，和增調軍隊來華與繼續已得土地所動用的財力，較之戰爭開始時，當然要增加了幾倍。日本應付此巨量戰費的支付，另有增稅和發行公債一途，結果勢必由軍事上的冒險，而增加了國民生活底痛苦。一九三一年到三二年，日本年可開支佔國民經濟收入底百分之四，五，在一九三六年時也不過佔百分之八，一，而在侵畧中國戰爭爆發後的一九三七年，年可開支差不多就佔了全國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了，且到出下表來作證明：

由於日本經濟危機的日益加深，而必然引起政治的惡化，神戶五千軍隊的反對來華作戰，和最近大坂市八民陣線的示威運動，和普遍深入於勞動者羣為各種怠工運動，都說明中日戰爭由一天延長一天，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危機是更加嚴重。日外

相廣田七日對其國電協會會員演說，也公然承認今日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嚴重局勢的時期，謂此種嚴重局勢的造成，一因日本現在下最大決心壓迫中國，二因中國與列強的關係極為複雜……由此可知日本政府之代理人也高呼着國難當頭了，這決不是大和民族的謙遜之辭，相反的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走到末落之路最後的呼號。

四、敵人碰到歷史上一个最大的失敗。

我們體認了日本經濟基礎的脆弱，和它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已經很清楚的知道，日本實在不能支持長期戰爭。中國則完全相反，九個多月來中國人民底英勇果敢的抵抗精神，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的鞏固，和人力物力動員的逐步成功，社會安寧，戰時金融穩定等，都足以昭示着中國不祇是具備了長期抗戰的起碼條件，而且有復興民族的信心。

中國是在抗戰中找尋一條生路，一面建設，一面生產，在抗戰中消耗敵人的實力和經濟力，在抗戰中獲得國際間許多的同情與援助。日本則是完全相反的，它在戰爭中增加國內政治經濟的危機，增加軍隊與民衆的磨擦，增長革命勢力的開展，和在國際間日陷於孤立。

在這兩種的對照下，我們不難找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也許我們不能直接地「打倒敵人屈膝」，但敵人必然在我們長期抗戰中，增到它在歷史上一个最大的關頭，而終歸失敗的。

張國燾敬告國人書

——并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認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神無間，抗戰到底，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於四月初自廣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迫切之需要，而其願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因即離陝來漢，冀與此間中共中央負責諸君，詳為商討，期於抗戰事業，更作進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即受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處分，并造作種種謠言（如加本人以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并進行破壞抗日團結等不經之詞）當即就本人政治意見，簡畧有聲明，其要點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決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并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為國家民族效力。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三民主義為今日之必需，中國國

民黨為主持抗戰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為全國惟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神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的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至誠態度與中共中央諸君初步商討，未蒙採納，今後仍望中共同志，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

上之簡畧申明，本人自信對於當前政治需要，尚無不合之處；乃近見武漢中共負責人公表函件，對於本人與主張行動，續有詆誣，綜其所述，無非蔑棄真理，偏執已見，甚至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以遂其抹殺政治商討，維護局部利益之私圖，如此足徵中共負責諸君，對於近代政黨黨員應具自尊心未甚重視，政治道德亦鮮顧及，此本人深為惋惜者也。

當茲抗戰建國之嚴重關頭，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戰士，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

，均有放棄過去一切成見，矯正其政治趨向之必要。并應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努力完成復興民族之大業。據此觀點，及因此而引起之爭論，畧陳梗概，邦人君子與中共諸君，幸垂察焉。

關於中共政治路線之全般檢討，因範圍過廣，此處暫切深論，僅就目前整個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戰建國基本觀點，加以攷察，本人確切相信中共政策錯誤之發生及其過程，實非偶然，而且這一錯誤過程，直到今日，還未停止，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線，向來是環繞着一個錯誤軸心而轉動，這個錯誤軸心的構成，可從下列諸點，加以簡略說明。

第一，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與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為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剷除封建殘餘，改正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爭取領土主權之完整與政治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先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由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

况也。此項見解，絕非君完合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本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佔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防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羣衆都是這些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

中國共產黨雖亦見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瞭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惟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形勢，基此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即在今天，亦未曾表裏一致地改正過來。

復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爲反對封建割據，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其爲進步的革命步驟。中共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系，并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

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煞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均已確証其誤。

第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爲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爲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爲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份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牠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尙擔負着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爲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爲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爲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証，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尤有進者，蔣先生爲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藉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主張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時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

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是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第三，中共對於中國革命之錯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固執成見，於是形成其一般策畧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之缺陷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愈益充分暴露出來，中共策畧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爲不顧革命所必需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自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橫暴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牠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牠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爲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形勢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從中央政令，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擁護其對小組織

的利益，因而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見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兩個以上不同政治團體的暫時聯合，此政治團體乃基於其社會基礎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亦異：一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主義的政黨，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政黨，兩者間之利害畢竟是不能和的，這裏便隱藏着過去歷史重複的根源。吾人近來習聞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爲己任的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爲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統一戰線之外，而予以打倒；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誤謬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若外人租界，封鎖尤嚴。如斯作法，豈以爲人盡可欺耶？竊意中共諸君如果承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與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統一意志抗戰建國之萬分必要，則應毅然決然放棄這些成見與作法，開誠佈公，與國人相見；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根據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上下願作列提議，希望中共

同人予以善意考慮：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中，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務必言行合一，不再作與比相違反的宣傳和組織。基此立場，中共同人應自動破除門戶之見，泯滅界限，與國民黨黨員同在。蔣先生領導之下攜手前進。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國家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第八路軍，舊勇敵，深爲國人所贊許，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如此一面可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減少一切不必要之顧慮；

一面於彼此融化之過程中，互相交換經驗，則今後裨益抗戰實力，當非淺鮮。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亦應奉命中央，充分發揮其抗戰作用。

第二，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點，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謂「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的具體內容。

本人與中共歷史關係甚深，由於近廿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

族危如累卵，更不願躬陷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猶憶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所領導之一方面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藏康地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爲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于形成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會合。

本人到達陝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實質則係軍事陰謀，本人事先並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中共負責諸人，均不免有感情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採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于此可見中共公表文件所謂本人當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

有企圖的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認識中共彼時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次政策之執行，仍係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東等所保持之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許多爭執，故此大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共赴國難之堅決信念，光明正大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加不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蔑，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動的宣傳，企圖對內壓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份子，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劫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勢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

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共同人，更為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亦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底於成，此不僅個之幸，亦全體民族之福也。(完)

華南唯一大報

中山日報

消息最確實
記載最詳細
言論最正大
編排最醒目

價目：

日報每月國幣一元
夜報每月國幣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

篇幅：

奉令現暫日出紙一大張半
增刊特刊 隨報贈閱

社址：

廣州市光復中路七十九號

電話：

編輯部 一一八二〇
營業部 一〇六七五

汗血週刊

第九卷 第二十七期

二十七年五月九日出版

「汗血文化」的再怒吼

劉百川

從紀念三五五寫到兩個革命階段

命階段

莫子材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抗戰動向

戰動向

香棟方

寫在討論人民生活問題前

抗戰中的改善民生問題

羅汝榮

國際形勢急轉下與中國

四強公約

君况

集總安全制度之沒落與今後國際局勢

後國際局勢

陳安仁

怎樣纔能完成殲滅戰

節約與刻苦

何士法

魔權裡

殷佩

請閱——新型的廣州

民族日報

資料比大報豐富

副刊比小報精彩

言論嚴正 編排新穎

消息迅速 定價低廉

社址：廣州市光復中路

廣武道上(征途紀實) 培 根

我已於三月廿一日晚由廣州出發了，現在正在旅途中——韶關英德站過些，這裡的風景是多麼的美妙，幽泉奇石，無所不有。

現在在火車上看見敵人飛機所遺下的彈穴，真令人吃一驚，不過敵人的飛機師大都吃了不少豆豉，他們所投的彈，全部落在鐵橋的附近，要是拋過一丈，我們便沒法通車了。

昨晚睡了一晚，睡的祇是車卡的地板，膝屈着，背彎着，像一隻澳門明蝦，睡覺了，滿面是火屎，像個趙公明。現在火車停下，我便停筆和鄰座的一個中大同學去投寄。

四、一日於英德

當我們的車由廣州開行後，大約半日後便過了英德，翌日十二時到曲江縣屬的大坑口，這時有敵機來轟炸，我們便由隊長領導向四面散開，敵機到英德向放在這裡的車卡投彈，怎知我們已到了大坑口了呢？在大坑口避了點多鐘，才解除警報，繼續進行。

韶關被敵機炸的非常厲害，幾百間店子沒有一間是完整的，市面行人也沒有，

只有三四檔小販在擺賣着，遠遠有一個警察，情況可憐。

昨晚兩點我已離去廣東境界，現在到湖南公平站，這信是在這裡寫的，寫到這裡，「起來！不願做奴隸的……」大家又大唱着歌了，我不得不停着筆也和着唱，明天的旅途怎樣，到時再告訴你。

四、二日於湖南公平站

三

××：

自出發後，我們一共十一下火車，浩浩蕩蕩的，由廣州經廣東的源潭，琶江、沙口、馬霸、韶關、樂昌、湖南的彬縣、陽、耒陽、中岳衡山、錄口、七斗冲、現在已行了一晚兩天半才行得一半路，還差差不多一半的路程，我們在車上吃的是乾糧和鷄鴨蛋，這裡的蛋很便宜，一毛錢可購五個，三幾毛錢，便可吃一只鷄。

在車上平方五尺的卡位上，要睡六條大漢，自出發至今沒有刷過牙齒，洗過腳，睡覺時因地狹小，常常會被睡在附近的把臭腳塞進口裡或踏到頭上或打在胸上，睡時有屈成蝦形的，有成元寶形的，更有坐到天明的。

四月二日過耒陽，全隊團員在這裡用飯，炊夫每大隊祇有十多個，弄了點多鐘才有飯吃，供膳的是十二三個蓋頭和一些切菜，用間成格的銅盤盛着，隊長命令下

了才准吃，初時我們都不懂，盛了飯便吃，結果給隊長罵了一大頓，我現在已過着軍人的生活了，我很樂意過這生活。

每逢車上在一個地方停下時，我們便像一羣餓虎般，一擁便把這裡賣的東西吃完，把這裡的水用完為止，幸得湖南人大都是和藹忠直的，但有些也很愚蠢的，這裡的人個個都穿鞋穿襪，他們認為給肉體與人看是一種奇恥大辱。現在車到株州了，就在這裡收筆吧。

四、三日於湖南株州

四

××：

我已於四月五日下午七時抵武昌，共坐了四日四夜的火車，行了二千多里的路，在車上過了四晚夜和沒有吃了幾天飯；但精神却很愉快，因為同坐的都是志同道合的青年，整天的唱歌，談天，我們的教官也在後面唱着京曲，所以不感到痛苦。

現在我已過着軍人中生活了，這裡的生活是很嚴格和克苦的，睡的暫時仍一隊隊的睡在大禮堂上，吃的是白飯，九個同學一圍，用分成三格的銅盤盛着小小的大頭菜、蒜頭等供膳品，吃飯時必要先集合，一圍圍的圍定坐在地上，不許動，不許嚼，隊長下一聲，「開動」命令之後，才搶着吃，吃完後不許有飯和菜汁落在地上。

(待續)

心軸小

(一) 不要誤解了「自由」

「自由」的本身沒有罪惡，而有不少人却利用「自由」，以造成了許多罪惡。青年男女要藉戀愛自由，可以私奔，可以苟合；汽車夫要藉駕駛自由，不服警察指揮；壯丁可藉擇業自由，可以逃避兵役，這正是因為中國人向來所享得到的漫無限制的自由太多，而整個國家遂陷於無組織無政府的狀態。要救治中國今日重症，是要從限制足以破壞民族利益的自由入手；換言之，凡是國民一切之言論行動之自由，祇許在國家民族之福利圈內言之，否則自由是要受限制的，這是任何文明國家，要維持其國家之安泰的必然手段。中國國民黨此次臨全大會，在抗戰建國綱領中也明白宣示：「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合法之充分保障」。這是很明顯的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是以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為標準，乃近來有×黨人，專以西歐賣不出的殘餘階級鬥爭理論，盲抄濫翻，藉出版言論自由之名，以行其鼓動階級鬥爭，攫奪私利，破壞民族統一戰綫之實。這種在法律以外的自由，我們要維持整個民族的安泰，是萬不能容許的；故請反自由的人們，不要誤解了自由。(存)

(二) 只知祖國不計其他

涼城前蒙古軍慕新亞團長，為激於愛國熱誠，反正殺敵，立功至偉，其通電之

沉痛激昂，最令人振奮者，其中有云：「新亞等抱絕大犧牲，家產遺產父母妻子，悉拋敵方，只知祖國，不計其他。中國過去的積弱，是因為一般國民只知其他，不顧祖國，苟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均能像慕團長們一樣肯犧牲父母妻子廬舍，來為祖國，則日寇難頑，不足為患。寄語全國同胞，大家今後應立定「只知祖國，不計其他」的決心，則國事可為矣。(吾)

(三) 要朝着危險的方向前進

大官先逃，小官後逃，老百姓是不能逃，這是抗戰以來的痛心現象！我們並不是主張婦孺老弱等待着做砲灰，不過我反對大小官爺以「逃」字來了了他自己的責任，什麼才是安全的地方？雲南嗎？貴州嗎？四川嗎？不！大家如果朝着川、滇、黔、湘、川、滇、黔不久也變為危險的地帶了；什麼才是危險的地帶呢？江、浙沿海？冀、魯平原？不！如果我們大家都向着這所謂危險地帶，拚着命往前衝，敵人崩潰，這危險地帶也要變為安全了，總之，背着敵人往後逃，永遠是逃不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因為我們能逃得到的地方，敵人也追得到，只有萬眾一心，向着最危險的地帶前進，這危險的地帶，亦變為安全了。(友)

(四) 不要使作海外廝公的人坐享太平

在平時有許多滿口愛國救國的士大夫，冒牌名流，到了現在却鴉鵲無聲，逍遙

國外，藉平常刮來的孽錢，安作海外廝公生活，既不出錢又不出力；國家亡了，他們準備在日本大統治下做富翁，國家強了，他們又回來升官發財，這班沒有廉恥，沒有心肝的狗東西，中華民國實不需有這種人，我們要以最嚴辣的手段來對付，對付的辦法，我們提議有至低限度要做到下列兩點：(一)政府應以嚴密方法調查，凡在抗戰期間政府大小官吏或成年男子如非受政府之特殊任命，私自逃往外國(香港澳門亦在其列)將通令全國永遠不准任用，並遞奪其公民資格。(二)政府應通告各國，中國政府，得以存在外國銀行之中國貯戶存款，為外匯基金，(詳細辦法參看本期洪瑞堅先生論文)必要時並得以之償付外債，或購買軍火，如是，權到義務方不至相懸太遠。不要使作海外廝公的人坐享太平。(友)

貪污史料

一、潮安縣第二區仁和警察所所長曾時瀾，收規包賭，被當地人士向省政府密告。吳主席據報後，以該所長違法殃民，赫然震怒，即電令胡專員，會縣長，將該所長撤職扣留查辦，並加派劉視察赴潮，會同專員公署審訊，証據確鑿。聞吳主席對此決予嚴辦，以儆貪污，而維法紀云。(五月二日香港工商日報)

二、海豐縣府秘書吳潤泉，財廳增城從化稅收主任畢香生，因舞弊案扣留解省，移送廣州行營核辦。(五月十六日廣州環球報)